

贺
笠
著

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LUNZHONGGUOTESHESHEHUIZHUYIJINGJI

经济管理出版社

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贺笠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F84 / 1P

责任编辑 张丽生
版式设计 蒋 方
责任校对 贾全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贺笠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2

ISBN 7-80118-926-4

I. 论… II. 贺…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经济模式-研究-中国 IV. F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158 号

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贺笠 著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6.5 印张 161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ISBN 7-80118-926-4/F·836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通讯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

联系电话:(010)68022974

序

贺笠同志逝世一年多了。他的未完成的遗著《论道德》一书，先已于今年6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现在即将付梓的《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是他的最后一部遗著。此书的出版，除了它的学术意义外，也是作为我们对亡者的缅怀和追思。

贺笠同志在30年代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长期在解放区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解放后自50年代起，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我和他曾在同一研究室共事20年。他作为研究室的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工作勤奋踏实，思路开阔，对我国的农业经济问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十分注重理论结合实际，率领全室，长期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并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准备写出一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研究著作。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这一切。1973年，从“五七”干校回京后，患了脑血栓，但就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思考和研究。10年浩劫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迎来了学术繁荣的春天，他既为之欢欣鼓舞，又深感岁月易逝，人生易老，时不再来。1982年离休时，已是年逾古稀了。为了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为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贡献自己最后的心血，他决心振奋精神，重新投入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并撰写出他的学术论著。1989年查出患有癌症之后，他感到所剩时间不多了，更以十倍的努力，每天伏案耕耘不辍，几乎是废寝忘食。终于在1993年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专著《农业是国民经

济的基础》一书。接着他又把视角从农业转向整个国民经济的研究,着手撰写《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尽管他的病情在不断恶化,但他仍坚持写作,一天也不放松。他要与死神赛跑,尽快完成他的著作。与此同时,他感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整体性的道德滑坡现象,十分严重,深深困扰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在基本完成《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初稿后,又立即着手写作《论道德》一书。但是与病魔的10年奋战,特别是长期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写作,终于耗尽了他的心力。在《论道德》只完成了前半部分时就逝世了。

贺笠同志逝世后,其家属委托我担负起整理出版《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论道德》二部遗著的工作。由于作者是在严重病痛的情况下写作的,不仅文字字迹颠曲难认,且行文中常常出现思路中断和前后重复等现象,所以整理的难度比较大。好在作者生前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找我讨论,尤其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书,有些地方我还帮助做过一些文字的润饰修改,因此对他的思路 and 观点,我比较了解。在所有的整理修改中,我都充分注意尊重作者的思路 and 观点。文中某些必要的修正与改动,我想如果作者还活着,也定是会认同的。

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面对这二部遗著的出版的。因为它是一位耄耋之年的学者,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用生命的最后余热写成的。对于它的学术观点,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对他的这种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敬业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朱 家 桢

1999年11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	(25)
第一节 革命的最高目的是发展生产力	(25)
第二节 实现工业化是振兴民族经济的历史要求	(29)
第三节 中国工业化的前提与基础——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32)
第四节 前苏联工业化的经验	(40)
第五节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点	(44)
第六节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农轻重为序	(50)
第七节 改革开放,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	(53)
第八节 中国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成就	(59)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63)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低,底子薄	(63)
第二节 旧中国是以落后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 经济	(65)
第三节 新中国对自然经济的改造	(69)
第四节 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因素	(76)
第五节 结语	(83)
第三章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流通	(87)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农业产品的交换	(87)
第二节 农产品自给性与商品性的矛盾	(90)
第三节 自由市场在社会流通中的作用	(92)

第四章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99)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99)
第二节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回顾.....	(104)
第三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然趋势.....	(117)
第四节 由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是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	(120)
第五章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33)
第一节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所有制的改革.....	(133)
第二节 发展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45)
第三节 组织大型企业集团.....	(155)
第六章 加强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导作用	(161)
第一节 保护国有企业.....	(161)
第二节 关于承包制和国有制.....	(163)
第三节 企业领导人的选拔.....	(169)
第四节 以高科技改造国有企业.....	(174)
第五节 加强企业管理,严格经济核算	(176)
第七章 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	(182)
第一节 加强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182)
第二节 宏观调控与产业结构.....	(185)
第三节 宏观调控与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190)
第四节 宏观调控与财政金融的平衡.....	(193)
第五节 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197)
结束语 坚决惩治腐败,是搞好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	(200)

绪 论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下,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题,向全党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这是中国迈向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文件明确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它把邓小平同志多年来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概括在“邓小平理论”这个范畴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续。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哲学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句话的提出并不是为人们一般地学习理论,而是邓小平根据当时领导上的错误提出来的。从1958年中国大跃进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和毛泽东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产生过一些错误的决定和行动,需要加以纠正。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当时有人曾提出两个“凡是”的理论,认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就像两个紧箍咒扣在人们的头上,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将使我们的思想僵化,使我们的工作无法发展。因此在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这两个“凡是”遭到邓小平的反对。邓小平在《两个凡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就曾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从过去的切合实际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根据客观发展的实际,决定新的政策。以后又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样才在全国打开了解放思想的局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果中国革命不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某些同志只图从城市暴动中夺取政权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另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途径,中国革命也是难于取得胜利的。所谓解放思想并不是无根据的乱想,它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客观规律,从规律中寻求正确的思想,这才叫真正的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句的基本精神是统一的,是不能分开理解的。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必然陷于胡思乱想。

“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句有名的成语,它代表了中国人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个命题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在 20 世纪初的湖南岳麓书院曾以“实事求是”作为横匾挂在讲堂正门。毛泽东在这里求学时,就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传入中国,于是毛泽东就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给予新的解释,又把这四个字嵌在中央党校的大门口,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指针,成为中国人民最容易理解的马列主义思想。实事求是,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大问题,我们中国革命过去受教条主义影响很深,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在 1942 年整风前,毛泽东就非常强调要改造我们的学风,提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中找出工作的规律。在 1941 年,作为整风的准备,他先写了一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章,他说:“我们的工作必须是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同志这个解释,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他不仅要尊重事实,而且要从客观事物的研究中找出它的内部联系,即规律,作为人们行动的指针,这就大大丰富了实事求是这一光辉思想的含义。后来在整顿“三风”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学风问题,也就是要求我们的同志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做死教条,而是要当成行动的指南,是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要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总而言之,必须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实事求是。

从1942年整风以后,我们整掉了各种歪风,纠正了过去“左”倾和右倾错误,使革命走入正轨,最终导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由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正确理解和运用,我国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接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时,由于发动了工人阶级的护厂等活动,并采取了适当措施,使我们接收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失。我们的土地改革,由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所以也能顺利地实现。以后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正确的。所谓“一化三改”,以工业化为中心,取得很大成绩。三改有两翼,一翼是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由于我们党在根据地进行了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已有一定的经验,采取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三步走的办法,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在手工业改造方面,也有很大成绩,只是有的规模过大,或者不适当的组织,忽视了某些手工业的特性,后来也纠正了。

至于另一翼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先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然后转入公私合营,最后实行赎买,也是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总之,由于实事求是的正确运用,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措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巨大成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成功和失败往往是互为前提,互相转化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样,如果忽视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也可能由成功转向失败。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巨大成功,到1957年我国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产生必然引起生产力的发展。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由于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事业等由私营转为国营,工人已成为国家的主人,工人可以管理企业,不再受资本家剥削,这就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另外,在农村由于农民组织起来,可以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力量薄弱无法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于是都愿意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当时首要的任务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国农村到处筑坝拦洪、打井修渠,真是战天斗地,热气腾腾,的确是一个十分激动人心的景象。

但是,在大跃进中,由于某些领导人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大跃进夭折。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是最明显的不实事求是,许多干部公然扯谎,形成全国性的大扯谎,以蒙蔽上级,蒙蔽党中央,致使党中央根据不实的报告而制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如高指标,1958年的粮食产量,据以后的评估只有4000亿斤,而当时报上的数字很高,经过中央核实后发表的数字为7500亿斤,由此又规定1957年的粮食产量计划为10000亿斤,这完全是不可能达到的指标。又如钢的产量,1958年是535万吨,本来已比解放时的15万

吨增加很多。根据当时的条件,1958年可以再提高30%—40%,这样逐步前进是可以取得好成绩的,但是当时要求过急,一下子就提出一年翻一番,并在全国发动大炼钢铁运动,不管有无铁矿煤炭和生产技术都要大炼,形成一种无法抵抗的强迫命令,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与浮夸风、高指标相伴而来的是共产风,当时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河流沟渠管理,所涉及的流域范围广,已超出了合作社的规模,加上共产风,于是就提出了按一乡一社,也就是以一万人或一万户组织人民公社。这种公社实际上是把贫富生产队都一律拉平,造成群众中的巨大矛盾。当时误认为粮食生产很多,人们就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于是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本来并不多的粮食又出现了大量的浪费,结果造成1959—1961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当时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也就是国家的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合一。国家干部对经济的领导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主要依靠行政的强迫命令。当时出现的许多“大兵团作战”方式,动辄就是由领导带领数千人数百人在地里一齐劳动,造成窝工浪费。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共产风的产物,当时的共产风之所以产生,不单纯是由于粮食产量的浮夸而引起的,粮食的浮夸只是一种导因。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处于封建官僚的剥削统治下,十分贫困,难得温饱,无论从领导者或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来说,都希望能尽早解决吃饭问题,做到全国人民都能“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像太平天国所主张的那样“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无论是领导者还是群众都认为现在可以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了,不仅仅是吃饭,几乎可以包揽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当时许多人民公社都提出所谓“五包”、“十包”,包吃,包穿,包住,包生,包葬,这就是说把一个人的生活全包完了。1997年11月《中华儿女》刊物上曾发表《毛泽东在

庐山下的是非风云》一文,说1958年3月毛泽东又重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盛赞《大同书》是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大同思想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它一直是中国最令人崇拜的传统思想,它是儒家思想中最辉煌的一章。

大同思想在许多观点上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特别欣赏康有为《大同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说:“康有为虽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但他把理想的社会具体化了。”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一种偶然的巧合呢?我能不能说是纯粹的巧合,这中间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中国的大同思想源于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的“礼运”篇。这一篇叙述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仪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篇所描写的确是古代原始共产主义的景象,并不全是孔子的空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同书》所描绘的原始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将来的共产主义理想必然会有共同之处。如都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原始共产主义保障了全体人民生活,我们今后的共产主义在消灭剥削之后,也要保障全体人民生活,而且是共同富裕,按需分配。毛泽东很欣赏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康有为是处于封建专制的帝王统治之下,并不敢公开提出他的观点,只是在背后偷偷地写了这一本书。而1958年的中国则不同,这时中国已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那种大跃进的伟大热潮中,由虚假的浮夸引发起来的共产风,使毛泽东也急于寻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因而出现了人民公社,不仅要实行

一乡一社的公社所有制,还要在公社内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当时许多公社的共产风五花八门,他们提出的“五包”、“十包”,实际上就是要实行按需分配。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把全体人民生活都包起来呢?且不说当时所报的粮食数字是过分夸大的,即使是实在的,全国每人平均 1000 斤粮食,难道仅这点东西就能实行共产主义吗?因此当时许多人的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实际上的平均主义。由于当时许多公社都吃了过头粮,加上当时大炼钢铁对粮食的糟践,以致造成以后三年的粮食危机。以后经过调整,人民公社已由大的公社所有制改为以小型的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采用工分制,取消公共食堂,所有的“包”都自行取消。这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才使人民公社走上正轨。

1958 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实质上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大试验,这次试验有很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证明社会主义是不能只是依靠正义、公理等空想来实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而得出的结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也和欧洲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只是一些空想。1958 年的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且由于生产关系的改造,已实现了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十分低下,也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何况我们当时许多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所提的共产主义是相违背的。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提法:“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5 页)当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要消灭一切剥削的,它除了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以外,也要消灭封建主的和奴隶主的私有制。至于其他非剥削关系的所有制,他并未要求共产党人去消灭。关于这一个问题,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1卷《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的末尾有两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这种否定并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后来，根据恩格斯的解释，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是归公有。而在公有制基础上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经过分配而为劳动者个人所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既然生活资料属于个人所有，那么个人对这些生活资料的消费就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它并不要求由社会包起来，由社会来处置。因此，当时人民公社的“包”的作法并不是合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的。而且“包”的弊端也不少。因为包的主动权在公社干部手里，有些干部控制着生活资料，不仅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而且威胁社员，有不服从的，就不给分配。当时吃食堂，有的村干部对不服从领导的社员实行“扣饭”，即不准社员吃饭，以惩罚群众。在1960年我曾参加河北某县一个区的整社工作，当时许许多多村干部都打人，群众家里的粮食被搜刮一空，造成严重的饥荒。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加政社合一，干部利用职权，既掌握生产资料，又控制生活资料，社员一点主动权都没有，甚至没有自由。我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民主，它的高度集权制度也可能成为转向奴隶制的根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十分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说明将来的共产主义是有充分自由的。这些充分自由必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如果没有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那就不可能有什么个人自由。1958年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是

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世界性的社会思潮,是许多善良人的理想,他们反对社会不公平,反对人欺负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渴望建立一种公平的正义的社会,这种愿望是好的,没有好的愿望就没有好的行动。但是仅有好的愿望,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把这种愿望纳入科学的领域,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按照各自不同的社会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前进,把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科学的轨道上,才能使之真正地实现。

中国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使中国人民深受教育。毛泽东同志虽然开始很重视大同思想,提倡共产主义风格,但当空想社会主义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之后,他都是认真纠正的。他首先提出了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线,他肯定了目前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另一条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线,目前的人民公社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一个穷国。”“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大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毛主席批评当时人民公社搞供给制是搞平均主义,并不是按需分配(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第111页)。毛主席是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交换的,他批评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说:“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同上书104页)

后来毛主席调整了人民公社所有制结构,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就是以原来的小队,一般只有二三十户,作为生产单位独立核算,这不仅便于领导,也消除了公社和大队平调生产队的

财产的权利。而且对过去已平调的财产,一律要算账退赔。指出那些平调的财产不是善财,而是劫财,不退赔不能平民愤。

在人民公社运动时期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特殊风。当时公社干部既掌握政治大权,又掌握经济大权,一切生产与分配都操纵在他们手里。而且公社初期各种制度都还未建立起来,尤其是民主制度,公社的三级制各级都应有不同的民主制度。当时的许多干部都不是普选的,而是上面任命的。广大社员都只听干部指挥,社员对干部不仅没有监督权,连发言权都没有,甚至挨骂挨打,这样有些干部就可以为所欲为,干部的特殊风就必然出现。比如,在食堂吃饭,干部与群众的待遇就不一样,干部多吃多占,群众则吃不饱。以后又在各地开展了“四清”运动,原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中央决定,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以改变农村干部的组织性不强和思想作风等问题。事实上农村中已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许多地方问题相当严重,于是毛主席经过调查,提出在农村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提出“后 23 条”,强调了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毛主席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是要清除农村少数坏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四人帮”所利用,清除走资派成为打倒一切干部的借口。的确,这个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也在向“左”倾错误方向发展。毛主席的“左”倾错误思想是反右倾运动中,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同志开始的。当时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认为我们有些基层组织领导与我们党不能保持一致,需要整顿,但是对于矛盾性质的认识却不相同,如刘少奇同志对于农村问题的看法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而毛主席却认为是阶级矛盾。这时毛主席感到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的,因而又强调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在 1966 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主要是反修防修。如果在全党通过整党进行一次普遍性的教育,